

## 疯癫的背后：福楼拜小说中疯癫形象的再诠释

申艺<sup>1</sup>，陈聪<sup>2\*</sup>

<sup>1</sup>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辽宁沈阳

<sup>2</sup>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辽宁沈阳

**【摘要】**福楼拜创作了众多具有鲜明疯癫特质的经典人物，如艾玛、布瓦尔与佩库歇等。这些人物属于不同类型的“疯癫变体”，突破了传统人物塑造的固有范式，深刻折射出现代社会中权力与个体主体之间的深层关系。同时，福楼拜本人离经叛道的思想与行为，也可视为一种有意识、自觉的疯癫实践。哲学家福柯与福楼拜具备诸多思想共性，其围绕理性与疯癫的系统性研究，打破了世俗对疯癫的片面认知，为长期被理性体系边缘化的疯癫正名，深刻揭示出社会权力运作的内在实质。本文以福柯权力理论为研究视角，重新解读福楼拜笔下的经典形象，挖掘出人物身上常被学界忽略的疯癫隐喻：权力规训造成主体独特性消解、多元话语失语；天真者的疯癫行为冲破理性桎梏，揭露理性世界的内在矛盾；理性建构的绝对真理存在局限性，而非理性个体具备重要的认识论启示价值。

**【关键词】**福楼拜；疯癫形象；权力话语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0日

**【出刊日期】**2026年6月9日

**【DOI】**10.12208/j.ssr.20260201

### Behind madness: Reinterpreting madness in Flaubert's novels

Yi Shen<sup>1</sup>, Cong Chen<sup>2\*</sup>

<sup>1</sup>Japanese Studies Institut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sup>2</sup>Asia-Australia Business Colleg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Abstract】**Gustave Flaubert has created a host of classic literary figures with distinct mad traits, such as Emma Bovary, Bouvard and Pécuchet. As different variants of “madness”, these characters break the inherent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 shaping and profoundly reflect the in-depth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individual subjects in modern society. Meanwhile, Flaubert’s unconventional thoughts and behaviors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practice of madness. Sharing many ideological commonalities with Flaubert, the philosopher Michel Foucault conducte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rationality and madness. His studies have overturned people’s stereotyped perceptions of madness, redeemed madness long marginalized by the rational system, and profoundly revealed the inherent essence of social power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power theory,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classic images in Flaubert’s works and explores the overlooked madness metaphors embodied in the characters: power discipline leads to the dissolution of subjects’ uniqueness and the aphasia of diverse discourses; the mad behaviors of innocents break the shackles of rationality and expos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rational world; the absolute truth constructed by rationality has inherent limitations, and irrational individuals possess significant epistemological enlightenment value.

**【Keywords】**Flaubert; Madness; Power discourse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十九世纪文学转型期的重要作家，凭借精准的文字把控被誉为“语言大师”。其创作兼具现实主义批判内核与现代主义创新特质，突破了传统文学创作范式。福楼拜塑造的疯癫形象极具颠覆性，如《包法利夫人》中沉溺欲望与幻象的艾玛、寓言式的瞎子，以及《布瓦尔与佩库歇》中痴迷科学、深陷知识虚妄的两名抄写员。福楼拜既借这些社

会“他者”批判黑暗现实，又对其抱有共情，并融入自身的思想投射。这种正视边缘“他者”的独特观念，与福柯的思想不谋而合。

#### 1 个体“他异性”话语的淹没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即以一个耽于浪漫、沉迷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女性，讽刺了浪漫主义遗风，并以其悲剧性结局折射出权力网络中“主体之死”的现实。

\*通讯作者：陈聪

### 1.1 艾玛的“浪漫化疯癫”

艾玛是福楼拜塑造的一个“堂吉诃德式”主人公。她本为农家之女,因从小在修道院中接受贵族式教育,期间读了许多夏多布里昂式浪漫小说,自此陷入爱情与传奇的幻梦中。平民阶级的出身与贵族阶级教育的差距,使得艾玛产生身份认同的错位。她一度沉溺于贵族生活的幻想:就像做着骑士梦的堂吉诃德那样,她给普通的菜肴取上各异的华丽名字,给自己的女儿取贵族的名字……按照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疯癫的分类,艾玛的行为可归属为“浪漫化的疯癫”,即不分现实的想象,甚至是迷乱的谵妄。这样的疯癫者会陷入无边无际的想象中,“这些想象是模糊的、骚动的,却又在一种共同的妄想中奇怪地相互妥协。”<sup>[1]</sup>

### 1.2 权力规训与主体的消失

权力并非单指政治性力量,相反,它可以自下而上产生,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权力与知识的合谋在话语实践中预设了主体,但主体却无法反抗被权力规训、支配的命运。福柯单向设定主体与话语的关系,说明主体只能被动接受话语或认知型的规训,很难能动地对话语进行重构和改变<sup>[2]</sup>。艾玛渴望摆脱庸俗的平民生活,追求浪漫爱情,但她又被宗教、道德与性别等规训所钳制,难以进行实质性反抗。十九世纪法国主流观念将婚外情界定为破坏婚姻家庭,甚至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教会通过教育和社会活动强化女性作为家庭道德守护者的角色认同。在“家中天使”的权力话语之下,艾玛注定要被定位为道德与家庭的守护者。当她试图叛逃时,便陷入了“圆形监狱”式的监视之中,任何越轨的举动,都会引发公众的指责与压制。因此,艾玛在追求自己的浪漫美梦时,也一再踌躇。她与第一个情人罗多夫见面后,于返回的路上胆战心惊,日常的细微声响被无限放大。为了减轻心中的负罪感,不信教的艾玛甚至还去教堂向神父忏悔。但当她重返平庸的日常生活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再度激化了她的“浪漫化疯癫”倾向。丈夫夏尔的庸俗、家庭生活的琐碎无聊,使她决意成为一名“浪漫的殉道者”。然而,在现实的关系网络中,除了情人,还有企图侵吞其财产的公证人,以及那个已不再推崇浪漫主义的社会。最终,艾玛为情人耗尽家财却遭抛弃,落得人财两空的境地。

福楼拜始终对一切压迫个体的权力主体持有审慎的批判态度。他自称不属于任何政党,甚至厌恶所有派别。正如他在书信中所言:“因为在这个时代,天真无邪已经成为一种幻想。甚至,独特的事物几乎就要消失了。”<sup>[3]</sup>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玛与福楼拜本人具有高度

的精神同构性。他们都以一种“疯癫”的姿态追求自我欲望,质疑理性,抗拒平庸现实对人的禁锢。正因如此,福楼拜那句“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著名论断,不无道理。

## 2 科学理性话语的解构

受科学技术发展影响,十九世纪的法国盛行科学主义,左拉自然主义与巴尔扎克实证主义文学就体现出此时社会的文学形态。资产阶级借机将科学话语确立为理性秩序,任何与之相违的观念与行为皆被定义为落后愚昧,即“非理性”。然而,所谓“非理性概念”与理性实际上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呈现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这揭示出理性秩序定义下科学话语体系的内在矛盾。

### 2.1 两个抄写员的“狂妄自大的疯癫”

《布瓦尔与佩库歇》讲述了两位抄写员布瓦尔和佩库歇在意外获得巨额遗产后,利用这些钱财大搞实验,盲目追逐知识风尚的故事。两人盲目地将科学等同于绝对进步,自以为掌握科学即意味着站到了时代的前沿。他们沉浸在一种“炫惑”状态中而不自知,不断做出既可笑又愚蠢的行为<sup>[4]</sup>。譬如布瓦尔一度对肥料产生狂热兴趣,便将动物血、肠子、羽毛、碱水等所有可收集到的杂物堆入肥坑。他甚至取消厕所,要求所有人将排泄物也投入其中,致使田间恶臭弥漫,而他却宣称这些污物实为“金子”。他们广泛涉猎农业、化学、地质学、文学、巫术、哲学等众多领域,却未曾真正掌握任何一门学科,只留下一连串荒唐可笑的事迹。布瓦尔与佩库歇可被归类于福柯所谓的“狂妄自大的疯癫”。他们“通过一种虚妄的自恋而与自身认同”,将本不属于自己的品质、美德或权力加诸己身,“把愚蠢当作智慧,以致谬误为真理,以谎言为真实,以暴力和丑陋为正义和美”<sup>[5]</sup>。

### 2.2 愚蠢与疯癫

福楼拜在年轻时就打算写一部记录人类蠢行的大作,《布瓦尔与佩库歇》即是其早年构思的回应。布瓦尔与佩库歇的最大特点可谓愚蠢。他们将患有脑膜炎的女人悬吊于房梁左右摇动,实施所谓的“物理降温”,结果被其丈夫赶了出去。他们嚼樟脑丸,把樟脑丸当鼻烟吸,甚至在白菜叶上练习放血。他们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引以为傲的葡萄酒,结果味道极差,让人耻笑。

《布瓦尔与佩库歇》的第二卷叫《庸见词典》,作者在此卷中以仿照词典的编撰形式,把一些单词词组分成条目,条目后提示的是人们在交谈中听到这些词后需要发表的见解和作出的反应,只要按照这些去做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入流的、体面的、受欢迎的人。

例如“文学: 游手好闲者的消遣”; “自然: 多美的大自然! 每次去乡下都要这样说”等。福楼拜以此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成见、偏见和定论。罗兰·巴特就曾将《庸见词典》与他自己的《神话集》相提并论, 认为两者都是对大众文化中的“神话”的“去神秘化”。这些群体中盛行的“神话”不过是些“庸见”“俗套”, 将小资产阶级的愚蠢显露无遗<sup>[4]</sup>。

布瓦尔和佩库歇的“知识谵妄”其实就是“认知异化”<sup>[1]</sup>, 他们的愚蠢展演是盲目跟风, 固执于“庸见”的结果, 也是权力生产知识的缩影。科学的滥用归根结底是因其被权力运作所控制, 权力将科学划归进步与理性, 致使无知者竞相追捧, 酿成伪科学泛滥的局面, 让所谓的科学话语体系遗漏重重。福楼拜以颇具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笔法细数两个“科学疯子”的蠢行, 堆砌大量荒谬的伪科学知识, 通过对被奉为“神话”的科学话语的“去神秘化”, 冲击了科学话语的绝对真理性认知, 以此宣告启蒙理性的破产, 展现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深刻反思<sup>[5]</sup>。

### 2.3 科学话语自身的矛盾

福楼拜既讽刺两人, 又对他们报以同情与敬佩, 因为他们既是愚蠢的制造者, 也是科学的“牺牲品”。一方面, 布瓦尔与佩库歇是自大自恋的“科学疯子”; 另一方面, 他们也为了追随所谓的科学理想付出了巨大代价, 遭受周围人的耻笑以及“假知识”的愚弄。藉此, 福楼拜也意图通过两人的“牺牲”抨击当时的科学体系话语。

福柯指出, 科学话语是权力建构的真理核心, 它作为理性秩序, 被权力用来控制个体。福楼拜所抨击的也正是这种被建构出来的科学话语, 而非科学本身。福楼拜在致高莱夫人的信中曾直言: “我要把伟人放在白痴的祭坛上宰杀……我将展示在文学中愚蠢由于与常人接近而成为唯一合法的存在, 相应地, 一切独创性都被谴责为危险的和可笑的等等……它自始至终都是喧闹的和反讽的, 充满引用、试验(它将证明自己的反面)和令人恐怖的教科书(这很容易找到)——旨在坚决消除所有的离心行为, 无论它们是什么。”<sup>[3]</sup>福楼拜将处于两极的“伟人”与“白痴”并置, 以中立怀疑主义的态度审视主流科学话语与权威, 通过布瓦尔与佩库歇的实验打破一元绝对论, 试图重振被世俗偏见所压抑的独创性。

“布瓦尔与佩居榭如同漫游在人类文明领域的堂吉诃德, 对科学的风车挥舞着长矛, 然而他们探寻的对象与探寻的行为本身都毫无意义。在人们大肆崇拜科学的十九世纪, 福楼拜能够指出科学的“愚昧”无疑是很

伟大的。”两人既是权力网络中被规训的客体, 又是主动内化所谓真理的主体。“抄写员”的身份暗示了其旧职的机械性——整日对文字进行纯粹复制。而在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后, 两人从抄写中解脱, 却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抄写”, 即继续复制由权威规定的各领域行为, 还常因无法理解或遵守说明书而失败。这种主动的“抄写”正是其自身悲剧的一面。小说第二卷的《庸见词典》以貌似权威的词条形式批判了群体话语的专断与教条主义, 嘲笑了盲从于此的愚昧大众, 同时也暴露了无知与权力附着在话语上的枷锁<sup>[6]</sup>。对词典的戏拟与对抄写员的嘲弄, 福氏意在于反映所“收录”与所“抄写”的科学话语自身的矛盾, 解构那些被神圣化了的科学话语。

### 3 统治权威话语的裂隙

继法国大革命后, 1848年革命再次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一方面, 它助推封建王权的彻底瓦解, 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成熟; 另一方面, 它又激化了劳资矛盾, 日益显示出资产阶级的虚伪本质。福柯晚年提出的“治理术”概念可以解释此现象——革命并非权力的终结, 相反, 这只是从君主专权向“规训-治理”模式的转换。他指出, 不同时代需要有与之适应的新的权力形式, 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往往需要通过生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形成和发展。人们对封建君主权力的批判、对民主政治改革的追求, 与其说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不如说是旧权力失效后新权力产生并替代的需要<sup>[7]</sup>。福楼拜同样看透此革命的实质, 他的大部分代表作都是以1848年革命为背景, 用反讽等叙事策略驳斥了历史进步论与统治权威话语, 质疑了对革命进行理性认识的可能性。

#### 3.1 资产阶级知识型的断裂

福柯指出: “权力试图使得知识分子在‘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等领域内变成权力的对象和工具。”<sup>[7]</sup>在《情感教育》中, 青年群体的政治立场往往就是为各机构建构的话语知识所塑造。例如, 列冉巴经常阅读的《国民报》是1830年由阿芒·卡雷尔创办的共和党报纸, 这塑造了列冉巴后来的共和立场。主人公弗雷德里克经常阅读君主立宪左派创办的《世纪报》等报纸, 因此他倾向于君主立宪。华娜丝倾向于社会主义、塞内卡倾向于革命等, 然而, 当这些权力叙事遭遇现实冲击而崩塌时, 被话语所塑造的主体便陷入价值虚无中。1848至1851年间法国革命的挫败以及弗雷德里克对革命态度由热衷转向幻灭直到最终的人生失败, 正是这一过程的深刻隐喻。

福楼拜独到的历史思维同样反映出他对权力话语

的怀疑与革命的反思。传统历史学认为主客观是清晰可分的, 历史认识等于历史实在, 规律和真理是可以客观把握的。但福楼拜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看待历史的方式, 因为历史只是现在对过去的思考, 因此历史永远需要重塑”。在《布瓦尔与佩库歇》中, 福楼拜就借人物之口提醒道: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捍卫某项特殊事业的动机, 如捍卫某个宗教、某个民族、某个党派、某个制度, 或为控制国王, 规劝人民, 树立道德典范。”可见, 他对坚持历史客观实在的反驳, 实际上也是对革命中统治权威话语的拒绝。所谓客观的历史话语实则是某集团利益的维护者, 这正呼应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裂隙。

“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系统的代理人”, 但由于“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那种为了表达被扼杀的总体真理的‘弄潮儿’和‘旁观者’”, 所以他们“要为反对各种权力而斗争”<sup>[8]</sup>。作为“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 福楼拜自始至终都在与权力话语抗衡。他将一些真实历史事件编织进小说叙事, 并非为了陈述时代真理, 而是为了展示真理生产机制本身的荒诞, 消解民主话语的神圣性。

### 3.2 非理性话语的光芒

在《包法利夫人》中, 有一个神秘疯癫者“瞎子”。他身体残疾, 满脸流脓痂疤, 行为癫狂, 被奥默视为亟待劳动改造的“野蛮”化身。但福楼拜并没有把瞎子简单塑造为社会规训的被动承受者, 相反, 他时常因游离于理性秩序之外, 而具有某种介入现实的神秘力量。瞎子出场次数不多, 但每次出场往往都是小说情节的重要节点。艾玛死的时候, 瞎子以其粗俗歌谣谶语般预示了她的命运。代表理性与进步的奥默借道德之名将他监禁, 但当局却因缺乏证据而将其释放, 让瞎子得以重新游荡在旧地。这样一个“赖头和尚”般的神秘疯癫者正呼应了福柯所揭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疯癫是“真理持有者”, 具有“揭示世界秘密”的职能, 它与理性并置互渗<sup>[1]</sup>。

通过各种开创性的文学实验, 福楼拜试图恢复非理性具有的反抗与启示的力量。他本人更是拒绝一切流派与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类, 以“疯癫者”的姿态在文学书写中获取愉悦。1852年, 他创作了一部名叫《螺旋体》的小说, 有学者称其是部讲述“一个幻觉狂疯子永恒的梦游症”的作品。在此书中, 福楼拜通过一个疯子的经历来说明幸福就存在于想象和疯癫中。主人公甚至在疯人院里与疯子们进行交谈时明白了社会真相, 认为自己是国王的那个疯子像个国王一样在思想, 而认为自己是音乐家的疯子则像音乐家那样行动。因此

“他在真理之中, 其寓意便是幸福存在于想象中。”<sup>[9]</sup>当社会个体被权力塑造为服从、节俭的主体时, 疯癫者反而因其思想的自由抵达至本真状态。

## 4 结语

福楼拜借助边缘者的视角, 以犹如手术刀般的笔触冷静剥离 19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所谓的文明外壳。从艾玛因“他异性”被社会共同体驱逐, 到布瓦尔与佩库歇的荒诞实验暴露出科学话语的内在悖论, 再到资产阶级话语的规训下弗雷德里克等的人生幻灭, 诚如李建吾在《福楼拜评传》所言: “有名的医生的子弟, 福楼拜先生捉笔就和别人操刀一样。”他以批判之矛精准刺入权力网络的中心, 纵切散布各域的权力关系。其对疯癫形象的文学塑造, 不单是文学意义上的超前挑战, 更是一种不着痕迹的社会反思。

## 参考文献

- [1] 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
- [2] 李智. 从权力话语到话语权力——兼对福柯话语理论的一种哲学批判[J]. 新视野, 2017, (02): 108-113.
- [3] FLAUBERT G.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M]. STEEGMULLER F, tran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4] 孙倩. 罗兰·巴尔特解读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榭》[J]. 外国文学评论, 2013, (03): 220-233.
- [5] 魏琛琳. 罗兰·巴特理论视域下的福楼拜作品——以《布瓦尔与佩库歇》为例[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5(01): 58-64.
- [6] 彭俞霞. 人云亦云之语言枷锁——评福楼拜的《庸见词典》[J]. 外国文学, 2011, (05): 150-155.
- [7] 杨生平. 权力: 众多力的关系——福柯权力观评析[J]. 哲学研究, 2012, (11): 78-83.
- [8] FOUCAULT M.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C]. BOUCHARD D F, ed. BOUCHARD D, SIMON S, tra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69.
- [9] 朱婷婷. 《情感教育》的“螺旋体”空间叙事[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5(04): 74-78.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